

# 轉型期的中國文化發展

• 湯一介

所謂文化轉型期是指在某一時期內，文化發展明顯地產生危機或斷裂，同時又進行急劇的重組與更新，在中國如先秦（春秋戰國）、魏晉六朝和五四時期（實可說是五四以來的時期）。而這三個時期也正是中國社會大變動的時期。文化的發展大體上總是通過「認同」與「離異」兩種作用來進行。「認同」表現為與主流文化一致的闡釋，是在一定範圍內向縱深方向發展，是對已成模式的進一步開掘，同時表現為對異己力量的排斥和壓抑，其作用在於鞏固主流文化已經確立的種種界限和規範，使之得以鞏固和凝聚。「離異」則表現為批判和揚棄，即在一定時期內，對主流文化的否定和懷疑，打亂既成規範和界限，兼容被排斥的，釋放被壓抑的能量，因而形成對主流文化的衝擊乃至顛覆。這種「離異」作用佔主導地位的階段就是文化轉型時期。

## 文化轉形時期的三種力量

在文化轉型時期往往並存着三種力量，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

主義。這三種力量，主要是針對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而說的。而這三種力量並存於同一框架中，它們之間的張力和搏擊都可能是推動文化和社會歷史前進的重要契機。在先秦時，可以說儒家是保守主義的文化，它主張保持傳統，或說主張「繼往開來」；道家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主義，特別是莊子追求一種精神上自由的境界，對傳統採取一種冷嘲熱諷的態度；法家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激進主義，它批判傳統，但卻要求集權，有強烈的專制傾向。到漢朝武帝以後，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入所謂經學的時代，使儒家思想成為正統，向縱深發展。但漢朝從政治上說是「陽儒陰法」，這種「陽儒陰法」的格局，可能是最不利於文化的發展的。（此非為本文要討論，茲從略。）

魏晉六朝又是一個中國文化的轉型期，同樣存在着三種力量：嵇康、阮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可以說是激進主義的代表，他們對名教（禮教）作了相當激烈的批判；王弼、郭象等企圖調和自然與名教，形成一種儒道互補的格式，「不廢名教而任自然」，

在文化轉型時期往往並存着三種力量，即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這三種力量，主要是針對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而說的。而這三種力量並存於同一框架中，它們之間的張力和搏擊都可能是推動文化和社會歷史前進的重要契機。

這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自由主義；另外還有對清談進行批評，要求恪守名教的勢力，如裴頠、干寶、范寧、顏之推等。這時期還有佛教的廣泛流行，使中國文化呈現出對主流文化（儒家傳統）的「離異」狀態。到宋明時，出現理學，得以使儒家成為正統學，縱深發展。這就是所謂新儒家，或儒學的第二期發展。

## 五四時期的複雜局面

五四時期一直到現在，中國文化又是一個轉型期，這一文化的轉型期也是由於社會處於一個較前兩個時期更大更複雜的變動時期，因此中國文化就呈現出極為複雜、甚至可以說很難理清的局面。五四時期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代表的激進派，以胡適、丁文江為代表的自由派，以及先是以嚴復、林紓、杜亞泉為代表，後是以梁漱溟、張君勱、學衡派為代表的保守派，無非都是面對中國社會的激劇變化和世界文化的大動盪這同一問題而顯示出不同的反應和不同的思考層面，這些問題不外是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如何接受西方文化、如何建構中國自己的新文化。

五四時期激進派與自由派曾一度聯合舉起反傳統的大旗，向正統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開火。自由派與激進派雖然在反對封建（或曰專制主義）的舊文化、舊道德、提倡科學與民主上是一致的，但在如何達到反封建、爭取民主與科學上觀點亦有分歧。自由派主張用改良辦法，激進派則主張用「大破壞」的方法。這種分歧曾表現為「問題與主義」的論戰。但未幾，梁啟超歐遊歸國（1920年春），發表〈歐

遊心影錄〉一文，認為西方文化已陷入絕境，而東方文化或可救世。1921年夏梁漱溟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講演，這可以說是保守主義者對五四以來反傳統的第一次認真的反思。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梁漱溟表現了對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一種理智的批判精神，認為中國應引進西方文化，讓科學與民主也在中國得到充分發展，但他同時也批評西方近代文化，並主張把中國原有文化精神重新拿出來。因此，梁漱溟文化觀的重點當然不是「反傳統」，而是考慮到在西方文化衝擊下，如何把中國文化精神恢復和發揚起來。在稍後有學衡派。學衡派的主要人物多是從美國哈佛大學回來的留學生，他們受到當時在哈佛流行的新人文主義思潮影響，提倡「昌明國故，融會新知」。無論梁漱溟或學衡派，雖然都不反對甚至主張引進西方文化，但他們都反對「反傳統」，因此無疑他們並非當時創造中國新文化的主流派，但決不能認為他們對推動中國新文化的建立沒有起積極作用。1923年發生的「科學與玄學論戰」，可以說是新文化派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大衝突。這次論戰，仍是激進派與自由派聯合，與保守派形成的對壘。張君勱的玄學派看來似乎失利，但這場論戰卻給人們留下許多問題。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的中國，各種論戰不斷，有哲學問題的論戰，有東西文化（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等等。但可注意的是，無論是激進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還沒有在中國文化上作出重要貢獻，同時這三派也還沒有哪一派在中國社會中取得領導（支配）地位，中國文化仍然處在多元的格局之中。

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初期的中國，無論是激進主義、自由主義還是保守主義，都還沒有在中國文化上作出重要貢獻，同時這三派也還沒有哪一派在中國社會中取得領導（支配）地位，中國文化仍然處在多元的格局之中。

## 形成體系的十年

從30年代中期一直到40年代上半期，在中國文化的發展中出現了一批有影響的或構成體系的代表人物：在激進派方面有魯迅等；自由派有張東蓀(多元認識論)、金岳霖、戰國策派等；保守派有熊十力、馮友蘭、梁漱溟、馬一孚等。還有一批有很高學術造詣的學者如陳寅恪、湯用彤、陳垣、董作賓、錢穆等。還必須注意這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導也都注意了文化問題。國民黨有陳立夫〈唯生論〉，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等；共產黨有毛澤東的哲學著作，特別是〈新民主主義論〉，現在看來仍然是一篇重要的關於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佳作。我認為這一時期可以說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比較好的時期，一批學者創造出了他們的哲學體系；一批學者的學術研究成果在世界學術界取得了公認的權威性地位。為甚麼這一時期可以取得如此重要的成就，我想也許有以下幾點原因：(1)各種思想是在一個平等的基礎上，能得以比較自由的發揮；(2)由於民族危機，使所有學者都不得不關懷自己國家民族的命運，憂患意識特別強烈，從而更富有創造性，但他們大多沒有直接來參與政治鬥爭，而是潛心於中國文化的研究和發展，以期從這方面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找出路。(3)從五四以來經過各種論戰，使一批學者意識到要解決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或創造新文化，必須形成體系，而不是只考慮解決某一具體問題。(4)從五四以來西方文化(思想)大量輸入，中國有不少學者在國外較長期的研究，因而對西方文化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但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仍然是學者們能在比較自由的環境下和不受當時政治干擾的條件下從事創作。今天看來，5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台灣的情況我不了解)沒有再造就出像40年代那樣自成體系和具有長遠學術文化價值的著作。也可以說，如果我們從歷史發展上看，這一批學者的貢獻，是二十世紀非常寶貴的財富。他們的思想，他們著作的價值，完全是靠(或者說主要是靠)他們的創造性勞動，而不是靠政治權力。我認為這一時期，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的思想都深入了，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和保守主義。

有一個問題或者可稍加討論，照我想，在中國傳統哲學中，認識論問題或者沒有從道德倫理學說分離出來，或者根本沒有涉及到這方面的問題，而30、40年代的中國，已有一些學者或多或少的意識到這個問題，並認為中國哲學應補上這方面。如張東蓀的多元認識論，金岳霖的「知識論」，他們主要是引進西方哲學。但另外一些哲學家如熊十力、馮友蘭、賀麟則不然。熊十力企圖借助佛教唯識宗來補充中國傳統沒有認識論體系這一缺陷，而且認為他的「量論」應是「西洋人理智與思辨的路子，印度佛教之止觀，及中國人之從實踐中徹悟，……《量論》中西印三方面，當兼綜博究」，建立「融思辨以入體認」的「思修交盡」的認識論體系。馮友蘭的《新理學》採用了西方新實在論的分析方法，他認為「新理學是要經過維也納學派的經驗主義而重新建立的形上學」。他的《貞元六書》中最後一本《新知言》，照馮友蘭的看法是要為新理學確立在世界哲學中的地位。他認為，他的新理學體系不僅是接着中國傳統哲學……宋明理學講的，而且也

今天看來，50年代以後，在中國大陸沒有再造就出像40年代那樣自成體系和具有長遠學術文化價值的著作。

當代的所謂「保守主義」派實際上都不排斥西方思想，而主張吸收西方思想，他們卻把自己的思想植根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之中，以便使得中國哲學更為豐富和發展。

是接着西方哲學講的，所以他的新理學不僅討論形而上學問題，而且要討論知識論問題。另一位哲學家賀麟在他的《知行合一新論》中明確提出，「不批評地研究知行問題，而直談道德，所得必為武斷的倫理學」，所以他主張要對知識問題作認識論上和心理學上的分析。可見，這三位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西方哲學衝擊下，不得不考慮西方哲學提出的問題，特別是知識論問題。因此，照我看當代的所謂「保守主義」派實際上都不排斥西方思想，而主張吸收西方思想，但他們卻把自己的思想植根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之中，以便使得中國哲學更為豐富和發展。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中後期，可以說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不斷地吸收中西方思想，而逐漸形成體系的時期。

## 教條式激進主義的文化統治

文化轉型期決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春秋戰國到西漢四五百年；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後也是四五百年。五四或者說二十世紀初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轉型才可能有一個結果。

1949年後，中國大陸起了很大變化。從蘇聯引入的斯大林主義，統治了中國相當長一個階段，在哲學研究的領域中，全盤根據日丹諾夫關於哲學史的「定義」來套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這種在思想文化上的教條式的激進主義，不僅排斥自由派，而且也打擊保守派。從1949年起不斷發生的政治運動就思想上說，都是以一種利用政治力量的官方意識形態來批判自由主義派（西化派）或保守主義派（維護傳統派），從而使中國的學術界喪失了活力，使文化的發展受到重大打擊。照我看，對學術問題採用政治運動或政治批判的辦法來處理也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1979年以後，

由於改革開放給中國大陸學術界帶來了一點活力，但也是在困難重重中徘徊前進。我想這不用我多加說明。

## 結語

據以上的粗略描述，我們是否可以得到以下看法：

(1)在文化轉型期，文化的發展既然只能是多元的，因此有積極意義的、能推動文化發展的激進、自由、保守三派應是互動的，這樣文化的發展才可以稱為健康。

(2)所謂激進派、自由派、保守派，必須分析。這三派如果是健康的，就不一定能用一種價值判斷來說哪一種更好，要整體分析。

(3)應該可以看出，三派的互動所形成的張力，才可能把文化推向後，如果只朝一個方向發展，那就可能越走越偏。四十年的經驗如此，特別是近年的經驗如此。

(4)文化轉型期決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春秋戰國到西漢四五百年；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後也是四五百年。五四或者說二十世紀初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我看還得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二十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轉型才可能有一個結果。

湯一介 195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現任北大哲學系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長和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等職，主要著作包括《郭象與魏晉玄學》、《魏晉南北朝的道教》、《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道釋》及編著多種。